

蔣介石保持著六點起床、端坐桌前一筆一畫寫日記的習慣。

他從二十八歲就開始寫日記，記錄下內心的感受、感悟；但他清楚，必須抑制住對重要人物的反感。感受絕不等同於處理問題之手段，如同行動與理念往往不可能一致。在政治形勢異常緊迫的當下，要做成大事就不可事事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在三月三日的日記中，他曾寫道：「見人面目，受人氣焰，羞辱情況，令人難堪。」這是針對武漢那幫人的。但真要真刀真槍與他們對著幹，則需要慎之又慎。

如今，在政治上已取得蔡元培、胡漢民等人的支持，身邊也有張靜江、戴季陶，以及陳氏兄弟的相助，這一塊出問題的可能性很小了。軍事上更順利一些，南京克服，有了立足之地，桂系李宗仁全力支持，廣東的李濟深也沒問題。只要將第二軍和第六軍調出南京，則無大患矣，到那時程潛和林祖涵便無計可施。再往北，只要將馮玉祥拉進懷抱，武漢便是竹籃打水；而徹底打敗孫傳芳，重挫奉系則指日可待。

此刻的蔣介石堅定了反共的決心，覺得動手的時間到了。自上一二年二屆二中全會後，他一直用懷疑的目光視察共產黨的

活動，強烈感覺到當年孫中山說的「中國的共產黨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沒修養的年輕人，不值得重視」完全過時了。才幾年？國民黨已不得不承認兩黨合作的客觀事實。蔣介石愈發地感到，共產黨不但有組織、有紀律，而且比國民黨的組織紀律嚴厲得多；對革命，他們有步驟、策略、方針、政綱，與其他團體完全不同。共產黨在不同時期提出的不同口號很有煽動性，使人民的目標變得清晰一致。比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個口號是怎麼來的？明明是「容共」，怎麼變成「聯共」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是北伐軍的口頭禪，可它卻是共產黨提出來的，弄得蔣介石自己也不得不以「革命者」自居，不斷提醒手下：「我自信是最革命的一個。誰反對我，誰就是反革命。」

胡漢民對中共的口號也心存餘悸，認為口號乃一大利器。中共利用口號在意識形態宣傳上很是成功，整個社會為之動搖。蔣介石想，這樣的政黨必定會吞噬國民黨，要趁他們年輕而毀滅他們。現在，就是打碎共產黨夢想的時機，而且時機稍縱即逝啊。

讓蔣介石優柔寡斷的重要原因，是中國共產黨背後站著一個巨人——蘇俄。而此刻，他的大兒子蔣經國正在蘇俄留學。熟讀國學的蔣介石知道什麼是投鼠忌器。

孫中山逝世後，蘇俄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勞動大學。招收第一屆學生時，鮑羅廷推薦了十五歲的蔣經國。在他推薦的二十名學生中，還有馮玉祥的兒子女兒、于右任的女兒女婿、李宗仁的內弟、邵力子的兒子、鄧演達的弟弟和張發奎的弟弟等。

經國是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秋去莫斯科的，他要在那裡學習兩年，如果順利，就該

於今年底畢業回國。蔣介石想起兒子離開廣州到上海候船間隙回漢口的事，經國的親媽毛福梅涕淚縱橫，堅決不同意兒子留洋。但她拗不過蔣氏父子，只得將親手縫製的棉背心給兒子穿上，千叮嚀、萬囑咐。當蔣介石聽到這些，想起自己的母親，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啊。

對這個兒子，蔣介石寄予極大希望，對他的學習也抓得很緊，並要求他學好英語、俄語。只斷斷續續上過兩年中學的經國，如今都上了大學，也不知他學習是否跟得上，只是現在他的安全恐怕比讀書更為緊要了。如果與蘇俄決裂，俄國人會如何對經國呢？蔣介石首先想到「人質」二字，如果經國出了什麼問題，自己又如何面對毛福梅呢？

蔣介石的腦海裡無時不在思考全局問題，北伐軍中的先進武器幾乎全來自蘇俄。但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十月，蘇俄就提供了野炮二百五十七門，射擊炮一百二十八門，重機槍二百九十五挺，步槍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三支，還有大量的彈藥。北伐軍艦第一軍到第八軍都配了俄國人做軍事顧問，甚至師一級也配了蘇俄顧問。一旦失去了蘇俄軍援助，結果會怎樣？還有實力與馮玉祥談判嗎？還有實力拿下北京嗎？雖然戴季陶、黃郛等遊說日本已有效果，其他國家呢？他們會不會支持我蔣中正？

外灘上，銀行、銀樓、倉庫、碼頭、海關、稅收等櫛比鱗次，商賈薈萃，擁有十里洋場的上海已不但是中國，還是亞洲、甚至世界的寶庫。遺憾的是，這座寶庫的鑰匙卻在洋人手上。好在還有中國銀行實際主持業務的副總裁張嘉璈視時務。

蔣介石清楚，要想打開這座寶庫，就必須取得租界的支持。如果沒有外援，只靠虞洽卿他

們的經濟能力，恐怕頂不住巨額軍費和未來的政府開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時，孫總理就已有教訓。蔣介石又想到宋子文。

宋子文如今被人稱作「中國之亞歷山大·漢彌頓」。這個中年人此刻是武漢方面一枚極為重要的棋子，是武漢政府的經濟命脈。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廣州發生中央銀行擠兌風潮，是他迅速從中國銀行借了五十萬元現金，成功化解擠兌，維持了中央銀行的信用。如今，武漢中央電令上海各機關，所有江浙財政須經宋子文辦理，否則政府概不承認，他的上海辦事處正在積極為武漢國民政府籌借資金。雖然已經用成立「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的手段來抑制他，可千萬不能小覷他個人的能力。

蔣介石想，如果他的大姊真能將他拿下，為我所用，就比古應芬強許多，這個人對外灘上的銀行恐怕比誰都熟悉啊。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倒戈，對鮑羅廷、徐謙他們便是釜底抽薪般的致命打擊，不知道宋霽齡運作到了哪一步？

讓蔣介石猶豫的還有一個因素：上海的工人糾察隊。深諳槍桿子重要的他，雖然已向上海總工會發出了一些非善意的信號，但應該選擇什麼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則還未確定。三月二十七日抽空接見上海總工會交際部主任趙子敬時，他只得表示說只要不闖租界，可擔保不繳工人糾察隊的一槍一械。

要解決有武裝的個人動用軍隊顯然是下策。已經跟李德鄰講過，「清黨」可以不用軍隊，「清黨」不是軍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但是，如果用在南昌任命的駐護特派員杜月笙、張嘯林來辦

這件事，他們能一舉解決工人糾察隊嗎？他們又應該以什麼面目來解決才能有理有節？

在這兩個問題上，蔣介石實際上多慮了：

其一，上海工人糾察隊的問題。蔣介石不知道莫斯科就在這幾天反覆給陳獨秀密電，內容明確：對蔣介石作出讓步，目的是不讓他倒向帝國主義那一邊。就在三月三十一日，共產國際還電示中共中央作了五點指示

一、在群眾中展開反對政變的運動；二、暫不進行公開作戰；三、不要交出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藏起來；四、揭露右派政策，團結群眾；五、在軍隊中進行擁護國民黨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對個人組織和與帝國主義者結盟的宣傳。

同時，還強硬要求中共中央：「請你們務必嚴格遵循我們關於不准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的指示；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黨及其長官發生衝突。」

正是在這一系列指示下，當蔣介石最終下決心從上海調走薛岳第一師時，中共中央才拒絕了薛岳提議在上海搶先行動抓蔣介石的建議。中共的回答是：不能與蔣介石過早發生衝突。

其二，程潛的問題。蔣介石愈加懷疑程潛，他在會上暴露了動搖的情緒，可以認定此人不可靠。武漢方面已任命他為江蘇政務委員會主席，他是不願意放棄南京的。蔣介石同樣不知道，程潛是有機會在南昌等地逮捕他的。就在一週前，武漢方面草擬過一份伺機逮捕蔣介石的密令，由「甘草」譚延闓親筆寫在一塊綢子上。三月二十七日，林祖涵（伯渠）特密令縫在衣服內帶到了南京，但程潛拒絕執行命令。他說：「我不能做分裂國民黨的罪魁禍首，這樣對不起中山先生。」

四月一日，會議依舊在沒有結果的討論中結束。接到李宗仁急電的李濟深和黃招竑分別從兩廣——廣東、廣西趕來上海。

大家都希望蔣介石拿出明確的意見，但他沒表態。因為江西的朱培德來電，勸他「一切慎重，以退為進」。他告訴大家：「既然大家都期待汪兆銘，那就應該等他回來主持大局。」

可連日來，不斷傳出工人糾察隊要以武力收回租界的消息，讓與會者備感焦急，頻頻表示時間不等人。

正當大家還在努力說服蔣介石時，有消息稱汪精衛經西伯利亞已抵達上海。蔣介石長吁一口氣，他要看看能否爭取到汪兆銘這位昔日對手。便與大家約定，暫不將正在商計中的「清黨」問題告之汪，因為這可能讓汪措手不及，而壞了大事。

可他還是不知道，汪精衛已經與從黃埔軍校失蹤的共產黨人周恩來見了面。護送汪精衛從西伯利亞到海參崴、再到上海的正是中共的俄國同志，而且他們正在策劃直接把汪送到武漢。

四月二日，蔣介石與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古應芬等文人，以及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等一干武將，來到法租界莫里哀路孫中山故居與汪精衛座談。蔣介石見到了宋子文，心裡咯噔一下，宋與汪密談了什麼？

從美國訂購的孫中山第四副棺材——美式銅棺就放在故居中，此時的孫中山尚躺在暫厝的

北京西山碧雲寺那副盛滿福馬林藥水的楠木棺中。雖然先生生前說過，想要像列寧那樣保留遺體供民眾瞻仰，也從蘇俄訂制了「水晶棺」。但他的信徒們寧願實現先生另外的遺願：我死了如果能葬在紫金山就好了。他身後的國民黨掌權者鐵了心要把領袖歸葬南京。安葬原打算在今年三月十二日領袖逝世兩週年舉行，但因戰亂，南京又是剛回到國民黨手中，根本談不上建中山陵的事。此刻，蔣介石與汪精衛的心中各自在打各自的算盤。而談判地點選在他們共同領袖故居，則有一番深意。

蔣介石看到，汪精衛滿臉春風，精神抖擻，一身筆挺的淡色西服，頭髮一絲不亂地往後梳著。汪似乎天生就是個領袖，往他面前一站，蔣介石忽然覺得自己猥瑣。從來就自尊心極強的蔣介石，面對這位趾高氣揚的手下敗將，心道：他真以為自己要東山再起了？

首先開炮的還是狂人吳稚暉：「共產黨已提出了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的口號。有消息說工人糾察隊要以武力收回租界，這勢必引起國際衝突，使國民革命在外交上造成一個不可解的糾紛。大恐怖的局面很快就會到來。」

汪精衛對此不以為然，不認為共產黨會如此愚蠢。他向大家簡單報告了此番遊歷蘇俄的情況，以及在途經莫斯科時與史達林見面的情況。但他沒有告訴大家，史達林囑咐他，回國後要說服蔣介石不要趕走鮑羅廷。汪精衛在史達林面前表示，要堅持聯俄聯共政策，做好蔣介石的工作。他告訴吳稚暉：「共產黨方面曾多次表示，絕無反對國民黨之意。」

吳稚暉說：「現在共產黨以武漢為中心，從城市到農村都在搞暴動。武漢的國民黨已被共

產黨所扶持，我們遲早要被吃掉。」他再次拿出與陳獨秀的那段對話，激動地對汪精衛說：「我可以下結論，他們告訴你的話都是騙你的。不要信啊！」

蔣介石順勢提出建議：「目前我先已處於一個危險時期，也是一個轉折關頭，如果放任共產黨猖狂下去，國民黨就要垮台。現在一切黨國命運都集於汪同志一身。」

汪精衛動了動他薄薄的嘴唇，不屑地笑笑，認為蔣介石是危言聳聽。他問蔣：「我請問蔣同志，你要兄弟回來，究竟是要做些什麼呢？」

蔣介石沒理會汪精衛的無禮，回答說：「我希望汪同志做三件事：第一是復職。這乃眾望所歸。第二是趕走鮑羅廷。此人自認為是我黨的太上皇，長此下去將生出大事。第三是分共。要讓共產黨從暗中走到明處，國民黨絕不再養寄生蟲了。此三件事應該立即做。」

汪精衛高傲地笑笑，表現出他不會被人左右的樣子，並說道：「總理親自決定聯俄容共，如何能輕言更改。此事關係重大，兄弟的意思是，必須召開四中全會對此作出決定，黨的民主制度、組織原則也是必須遵守的。」

吳稚暉聽了這話，「呼」地站了起來：「汪同志，現在是什麼時候？情況緊急，大禍就要臨頭，你卻還在對共產黨心存幻想，還講什麼遵守原則！」

接著，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相繼發言，反對汪精衛的意見，希望他不要偏袒中共。

吳稚暉大聲說道：「等到上海的工人糾察隊學武漢、九江，以武力收回租界，列強群起干涉；等到共產黨將國民黨蠶食殆盡，那就晚了，晚了呀。」

汪精衛依然不為所動，大談他在蘇俄的所見所聞，並堅決地說：「我是站在工農一邊的，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汪兆銘的敵人。」

六十二歲的吳稚暉忍不住心情的劇烈變化，竟「撲通」一聲向比他小十八歲的汪精衛跪下，含著眼淚說：「汪同志，你就放棄祖共立場吧，留在上海領導我們。」

在場的所有人都被吳稚暉嚇了一跳，一時會場死寂。愣在當場的汪精衛手足無措，忙站起來趕緊往樓上躲避。邊走邊說：「稚老，您是老前輩，這樣我受不了，受不了的啦。」吳稚暉竟還要爬上樓梯，大家連忙拉住他。

六年後，魯迅在其雜文〈新藥〉中把失魂落魄的吳稚暉比作被宮女洩欲後的「藥渣」，指出「也許連狗子都要加以踐踏了」。

吳稚暉的舉動在蔣介石眼裡，大概真像被用過的「藥渣」了，不知蔣介石是否被吳稚暉的這一跪嚇到了。男兒膝下有黃金，他不贊成如此。

見吳稚暉這樣的激烈也沒打動汪兆銘，看來這位自命不凡的廣東三水人是無法爭取到的。蔣介石立刻決定馬上召開一次會議，與李宗仁商量後，決定把會議地點放在龍華東路軍前敵指揮部。這裡既安全又保密。

臨出門，蔣介石特意話裡有話地對宋子文說：「請宋同志代我向你大姊致意。」

當天下午，一批以軍人為主的國民黨高級官員在上海龍華北伐軍東路軍前敵指揮部開會，

這次會議後來被稱為「中央監察委員會緊急會議」。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李濟深、黃紹竑、程潛、賀耀祖、陳名樞、周鳳歧、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陳立夫、邵元沖等人參加了會議。

但「清黨」發起人之一的蔡元培沒有參加會議。這是一個謎，是蔣介石對他不放心？還是他另有要事？

蔣介石在會上的講話比白天與汪精衛的談話更加明確清晰了。他說：「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國共合作時，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就不懷好意，他們的組織仍然存在，卻在我們黨內發展組織。自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後，共黨陰謀日益暴露。北伐軍到了武漢，中央某些機關和某些人受了分化，受了劫持，把武漢同南昌對立起來。如果不『清黨』，不把中央移到南京，並建都南京，國民黨就要被共產黨所篡奪，國民革命軍就不能繼續北伐，國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這是次一面倒的會議。所有出席會議的人目的基本一致：「清共」。他們的共識是：不「清共」後果就是被共清。這個共識的基礎是大家共同的利益。

李濟深在講話中點到中共在廣東的農民領袖彭湃；黃紹竑在講話中點到中共在廣西的農民領袖韋拔群；何應欽在講話中把引起美英炮擊南京的原因推給共產黨；白崇禧在批北伐軍占領上海後的種種問題，工人糾察隊打著支持北伐旗號封鎖租界，根本不服從北伐軍的指揮，結果把國外領事團弄糊塗了，不知北伐軍與工人糾察隊到底是什麼關係。如果與國外的軍隊發生衝突，不

但上海完了，北伐事業也完了。

所有人的發言都指向一個核心：共產黨在日益侵占他們的利益。吳稚暉用形象的比喻說明國民黨當下的處境：「國民黨已經變成了火中取栗的貓腳爪。」雖然出席會議的國民黨中央監委只占全體中監委的二分之一，但絲毫不影響陳果夫兄弟把會議的結果整理出《彈劾共產黨的議案》，並將會議發言整理出一個合法的文件《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開會紀錄》。

蔡元培在缺席的情況下，被推舉為會議主席。

應該說會議開得圓滿，但善察言觀色的蔣介石發現程潛坐立不安，這更加深了他的懷疑，此人不可靠。要想在南京扎根，必須除掉程潛和他的第六軍。沒動手之前，必須先麻痺、穩住此人，堵住一切可能出現的漏洞。他決定除了委任程潛為南京衛戍司令外，還調撥一部分經費給第六軍。

就在中央監察委員會緊急會議召開的同時，蔣介石的拜把兄弟黃郛受命與日本駐滬總領事矢田會晤。他代表蔣介石表明了兩層意思：一、蔣介石已決定整肅國民黨政府內部，與共產黨分離，將盡快解決南京事件；二、希望日本政府在這轉折時期對北伐軍諸事予以諒解，並調停各國不滿情緒。

四月二日注定是多事之日。蔣介石在當晚得到消息，南昌的左派推翻了前政府，有二十多名右派國民黨員被殺。不久前陳果夫他們對那裡的黨部進行過一次顛覆，可現在又翻過去了，這

預示著什麼？三天前，武漢國民黨中央改組了江西省政府，支持蔣介石的李烈鈞下台，朱培德任省政府主席。命令是二日傳到南昌的，據悉李烈鈞已出逃南昌。

是朱培德的問題，還是共產黨又開始動手了？這讓蔣介石頗費思量，北伐軍行營從表面上說還設在南昌啊。他敏感地意識到，必須先將共產黨把持軍隊裡的政治部解散，以防患於未然。他決定從薛岳與劉峙所轄一、二師下手，讓鄧演達以及他派到上海來的郭沫若等喪失其權。

四月三日，與汪精衛的商談在孔祥熙位於多倫路的宅第繼續進行，這是一幢具有濃厚伊斯蘭情調的阿拉伯風格建築。蔡元培、吳稚暉、李濟深等參加了商談。

此刻孔祥熙的官職是武漢國民政府實業部部长，但他並沒有認真履職，而是先於蔣介石趕到上海，與妻宋靄齡一起謀劃與蔣合作事宜。

孔祥熙與汪精衛是老朋友，都是〈總理遺囑〉的簽字人，孫中山長眠的那口棺材就是他捐的，當時在中國與孫中山連襟的只有他孔祥熙一人。儘管在商場政界混跡多年，但正式躋身國民黨政界還是上一年底從美國返回廣州後，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廣東分會委員、廣東省財政廳長。

這位出身貧寒、靠辦學起家的山西太谷人善打算盤，極其精明。他當然知道如日東升的蔣介石有什麼樣的價值，這一點與妻子宋靄齡不謀而合，決定投入「巨資」與蔣合作。要做成功這筆生意，他們分析自己最少有三點可以吸引蔣介石：

一、蔣宋聯姻。把三妹美齡嫁給他，使他也搖身變為總理的連襟，並由此身價大漲。

二、說服宋子文為蔣理財。在北伐的財政問題上，子文已讓蔣介石看到了價值。

三、目前西北方的馮玉祥正日益成為搶手的香餽餽，而孔祥熙與馮玉祥關係密切。

當年正是他帶著孫中山的《建國大綱》與馮玉祥見面，而在「北京政變」後，他又促使馮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蔣介石要想打進北京，聯合馮玉祥是條捷徑。

有了這三條，不怕老蔣不上鉤。而合作的事正在緊鑼密鼓。

對於在孔宅開會，汪蔣二人都是樂意的，蔣介石與宋靄齡更是心照不宣。

會議是昨天的延續，但汪精衛並不知道昨天蔣介石還召開了所謂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緊急會議，形成了議案。他依舊堅持自己的意見：武漢諸人非不可理喻，分共之事均應以會議方式解決。

吳稚暉一聽這話又急了，但昨天的會議讓他心裡有譜。直言道：「在申的監察委員會提出對共產黨的彈劾案，必將採取斷然處置，故只係通知共產黨，而非商榷。」

汪精衛再三強調只要他出面，是可以將武漢國民黨人約來南京的，通過召開二屆四中全會，也是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

蔣介石等人已得到從武漢傳來的昨日消息，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擴大會議上，根據孫中山的大公子孫科提議通過了幾項決議，其中兩項涉及在座的人：一是令蔣介石克日離滬赴寧，專任軍事；二是將李濟深、劉峙免職查辦。對於來自武漢的命令，蔣介石已有處理它的很

好心態，無非是一笑了之。他內心很高興武漢能將坐鎮南粵的李濟深也免職，正好把這位曾動員李宗仁、黃招竑加入國民黨的江蘇人往自己懷裡推了一把。武漢的那幫書生不懂啊，在有槍就是草頭王的年代，擴編軍隊易，撤掉將領難。更何況，出生在廣西的李濟深曾在梧州中學堂讀書，是眼下要利用的胡漢民的學生。

沒出蔣介石的意料，李濟深的「清共」做得極出色。兩週後，他在廣州大開殺戒，不但牢牢控制了廣東，也把黃埔軍校的「紅」色記憶通通抹掉了。

而武漢要撤劉峙，則從另一方面更說明了薛岳的不可靠。蔣介石心道，好哇，他們主動幫我對軍隊進行甄別。

汪精衛對武漢的決議也感到意外，但他自信有能力說服和掌握武漢的一切。只要穩住了軍隊，黨和政府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在調停蔣介石與武漢的矛盾時，他採取各打十大棍的政策，一方面表示可暫不執行武漢命令，另一方面又要求各同志不要擅自行動，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即四中全會）上解決，汪精衛也想通過會議牢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經過協商，初步確定了會期：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

態度激烈的吳稚暉平靜下來，他開始覺得汪精衛的意見是目前解決問題沒有辦法中的辦法，除非蔣介石宣布動武。

蔣介石則在會上一再強調，汪同志應留在上海指揮一切，如果去武漢必定會成為共產黨的人民。同時，他要求免去鮑羅廷的顧問之職。汪精衛不置可否，只說留待四中全會解決。

孔祥熙、宋靄齡在寓所舉行宴會，為汪蔣達成協議而祝賀。

蔣介石依舊滴酒不沾，他內心並不看好汪精衛的設想，但在沒有下決心以武力「清共」之前，這也算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宴會上的蔣介石更關注的是宋靄齡是否說服了她的小妹，這是高度機密，不能在這種場景下討論，但聰明的宋靄齡在敬酒時一句不經意的話，讓蔣介石兩眼放光。她說：「小妹要我代她向蔣總司令問好。」蔣介石立刻答道：「請夫人代我向美齡小姐問好。中正戎馬間隙當登門親謝。」

滿桌的人除孔祥熙外，沒有誰能聽出這兩人的話外之音。不苟言笑的蔣介石奉著白開水杯，微笑地跟每個人碰杯。他對汪精衛說：「兄弟將發表通電，率各軍一致服從汪主席指揮。」

當日，蔣介石發表了〈通告各軍、師長戮力北伐電〉。這份四百多字的通電，通篇貫穿一個思想，即：汪精衛是我蔣中正請回的，所以我唯他馬首是瞻。在通電中，他處處藉鼓吹汪而抬高自己。

「汪主席病假期年，不獨全國群眾渴望綦殷，而黨國要政亦受重大影響，中正迭電請求，今幸翩然再出，大旱雲霓，莫喻欣慰……」

對於黨國大計，並已懇切晤談，中正深信汪主席既出，必能貫徹其意旨，鞏固黨基，集中黨權，以底國民革命之全功，而竟總理未完之遺志。此後黨務、政治，既已負責有人，後顧無慮，中正唯當專心軍旅，戮力北伐……

自汪主席歸來以後，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唯有統率各軍，一致服從，至軍政軍令各有專屬，軍政大計，應歸統一，而中正獨司軍令，俾專責成，同心一德，完成革命。」

但在日記中，蔣介石記錄了內心的真實感受：「稚老甚憤激，談言甚多。然其結果，乃欲與共黨暫時妥協。惟請在武漢中央委員回南京來爾。」

他強烈地感到時間緊迫，且有陣陣殺氣撲面而來。汪精衛非省油燈，此刻的決策稍有不慎，則可能導致全盤皆輸。而實際上，他在軍事上的調度已經開始了。

白崇禧、何應欽已與程潛同赴南京，目的是勸說程潛離開南京去武漢「勸和」。根據情報，國民黨中常委、第六軍黨代表林祖涵已到南京，代表武漢方面慰問第六軍、第二軍，如此看來，白何二人是入虎穴。蔣介石認為，只要程潛離開南京，用一、七軍去對付二、六軍就容易得多。

此番白崇禧、何應欽到南京，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奉軍張學良已率軍南下，二、六軍應該渡江去進攻張宗昌，並在南京以北築成防線。這是一箭雙鵰之計，但啟動的關鍵是程潛的去留。

蔣介石堅信，只有南京穩如泰山，才可以放心實施下一步。原本蔣介石去南京的理由不夠充分，三月二十五日在南京下關，他沒有下艦，一直在考慮找什麼理由進入南京。現在武漢幫了忙，是他們要求我「克日離滬赴寧」，只要南京守軍順利調防，我便可順水推舟去南京主持一切。他焦急地等待南京的消息。

在蔣任第二次商談的同一天，英、美、法、日四國在美艦匹茨堡號上集合，討論對長江中下游地區採取強硬措施，包括禁止中國輪船在長江航行、截留上海海關關稅附加稅、摧毀兵工廠等。日本外相得知消息後，緊急約見英、美大使，告知了黃郛與矢田會見的情況。基於各國共同的利益，會議決定支持蔣介石反蘇反共。

爭取日本支持是蔣介石走的一條捷徑。日本人急於在中國擴大地盤，他們與奉軍在東三省已合作，但張作霖似乎不能使日本人相信，奉系能拿下全中國的控制權。經過戴季陶在神戶、東京、大阪等地一個多月用流利日語進行的公開演說，日本人對蔣介石抱有了希望，這才有田中內閣在英、美、法之間斡旋。有統計說，戴季陶在日本共演講六十四次，會見會談四十五次。

四月四日一早，蔣介石得到兩個消息。一個是好消息，程潛已說服林祖涵與他一起去武漢「勸和」，說明此前對程潛所做的一切都已奏效，原本「虎踞龍蟠」的南京城終於露出了一個大窟窿。蔣介石立刻以總司令的名義向駐守南京的二、六軍發出命令，要求在四月六日前撤離南京，渡江至浦口沿津浦路北上，準備進攻張宗昌。

發出這道命令，蔣介石心中是有底的。第二軍軍長譚延闓是軍政兩界的「甘草」，且久不在軍中，由魯滌平代軍長。譚氏在兩個月前曾私下對陳果夫說：「將來必定回南京隨蔣先生，並且今後一切必能聽蔣先生的話。請轉告蔣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會面。」蔣介石當然不知道，

就在兩週前，譚甘草還以武漢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在一條綢布上親自寫下了要程潛伺機逮捕蔣介石的密令。對蔣來說，第二軍唯一的障礙是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此人是留法的激進分子。好在魯滌平已是被說服不干預政治，對第二軍的調度應該沒問題。

程潛委任楊杰為第六軍代軍長，衛戍南京交賀耀祖負責。此二人均已暗中答應服從總司令的命令，加上何應欽、白崇禧在寧督促，調出二、六軍應該沒問題了。

蔣介石同時命令第一軍的兩個師隨後進入南京加強城防，這兩個師的軍官都是黃埔的子弟兵。另外，還委任隨他從南昌到上海的楊虎進入南京，成立勞工聯合會，為「清黨」做準備。

另一個是壞消息，從武漢傳來已免去蔣介石的總司令職。蔣介石立刻率眾人趕到汪精衛住處理論，可汪精衛表示他並不知道有這回事。

因為沒見到任何正式命令，儘管吳稚暉等人紛紛又是一番痛斥鮑羅廷及共產黨，儘管再次明確要以中央監察委的名義對共產黨提出彈劾，但汪精衛堅持認為，上海這些人的種種懷疑太過離奇，免去蔣介石職務是沒影的事。

然而，這個消息是真的。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根據軍事委員會的呈請，決定廢除全軍總司令，改為集團軍，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唐生智分別出任第一至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朱培德為預備隊總指揮，楊樹莊為海軍總司令。

這道命令特在四月五日發出。沒有證據說明汪精衛是知道這個命令的。但在聽到吳稚暉指

出不但國共合作要全面破裂，而且打算動用軍隊和警察拘禁共產黨人時，他不以為然，以沉默反對這種做法。

李宗仁等一看冷場，忙圓場說：「如汪同志有良策，不妨共商。」

不知汪精衛由於何種考慮，提出了三點建議：一、若此時同志們認為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的情形急迫，且他們陰謀破毀租界，則他可負責告陳獨秀使其制止；二、武漢此時如有搖動軍政之命令，可以不受；三、各地共產黨及工人隊如有反動情形，可以隨時以非常手段處置。

汪精衛指點江山般的言論並沒有說服蔣介石等眾人。此刻的汪精衛並未復職，他甚至沒有權力作上述表態，然而他的表態給了蔣介石繼續按自己的想法走下去的把柄。在蔣看來，武漢發生的一切已不重要了。

會議於午後一時結束。誰也不知道汪精衛會火速通過周恩來，找到陳獨秀商量如何辦。

善於蠱惑的陳獨秀一口否認吳稚暉等的指責，並用他喚醒了無數中國人的如椽之筆寫下〈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汪精衛匆匆閱後，同意交報社發表。正是這份〈宣言〉，給了本還在搖擺的蔣介石下最後決心的理由。

結束會議後，蔣介石直接去兵營對一師和二師的黃埔同學訓話。他第一次有意識地將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牌子亮出來，這是為將要執行的一系列行動助勢。

他說：「有人要我承認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我們身為黨員，對於本黨中央的決

議案當然要承認，但也不能盲目，因為本黨是有監察委員的。若監察出會議手續不合，或違反主義黨綱，就可以宣告無效。監察委員的特權，我們不能抹煞……」

此時，身在武漢的程潛收到第六軍方面的電報，請示是否渡江。程潛一驚，根本沒想到蔣介石動作如此之快。他剛向人表白：「不願與蔣合作，但不合作又無錢。」程潛馬上電令：第六軍不得渡江。然而，這份命令沒有到達第六軍，有消息說它被蔣介石的總司令部截獲。

與此同時，接到撤離南京命令的第二軍也有人急電武漢，尋求指示，但電話始終無法打通。於是，第二、六軍按總司令的命令開始渡江北上。何應欽則伺機包圍了第二軍少數留守部隊，對他們實行繳械。

當蔣介石等人五日早上看到〈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時，大罵汪精衛。誰也沒想到汪精衛會用如此手段，把尚在秘密進行的事情公開。

〈宣言〉在闡述了無產階級不會在中國實行獨裁制後指出：「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

現在國民革命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最後根據地上海，驚醒了國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謠、中傷、離間，無所不用其極……國民黨最高黨部最近全體合議之議決已示全世界，絕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在共產黨方面，愛護地方，安寧秩序，未必敢役於他人，對於國民政府不以武力

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贊同，總公會亦已發表不單獨衝入租界之宣言……」

蔣介石認真地讀了〈宣言〉，他慨嘆自己身邊沒有如此能寫之人，什麼「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追行。政見即不盡同，然如兄弟般親密」都是騙人的鬼話，但在不明真相的人看來卻是那樣真誠。

蔣介石仔細想想後認為，這份宣言是汪兆銘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宣言竟給人「共產黨是主，國民黨是客」的感覺，這讓所有參加這幾天會議的同志都怒火中燒。

吳稚暉在宣言中發現了許多原則性的問題。一眾人又趕到汪精衛處，剛見面就激烈地爭吵起來。

吳稚暉大聲斥責道：「聯共二字從不見條文。在我們國民黨的條文上，只有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而已。老實不客氣說，治理中國只有國民黨，沒有聯了共產黨來共治的可能。如果共產黨堅持共治，甚或想要獨治，威脅到國民黨目標，國民黨自不得不予以制止。」

結果幾句不合，三天前還向汪精衛下跪的吳稚暉竟當面破口大罵：「你連狗都不如，趕快滾蛋！」

汪精衛本以為這個〈宣言〉會給雙方都帶來希望，匆忙中也未對〈宣言〉斟字酌句。在他的心裡，共產黨也不過是手中的一張牌，此刻他需要用這張牌來制約蔣介石等一群右派。只是他沒想到，吳稚暉會如此辱罵他。

蔣介石在心裡強烈認為下手的時候到了，但需要用幾天時間作最後準備。如有必要，就把

汪精衛軟禁在上海。程潛離開南京是好事，汪兆銘離開上海卻是放虎歸山，與汪的全部妥協都是以他留在上海為基礎的。然而，蔣介石沒料到汪精衛會先下手，突然離滬。他的出走顯然不是被吳稚暉激的，而是處心積慮的結果。

原來，宋子文也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他來上海重要目的之一是迎汪復職，如果汪在上海出事，誰也無法向武漢交代，便於五日晚悄悄把汪精衛夫婦送上了江丸號輪船。六日凌晨，江丸號朝長江下游的武漢駛去。

《申報》報導，汪精衛二日晚就在楓林橋公署行宮與蔣介石晤談黨國大計，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在座。到底是蔣主動找汪？還是汪主動找蔣？從《申報》報導看，汪精衛在滬期間還是很低調的，與他七日到達漢口受到三十五人歡迎有天壤之別。上海特別市黨部等單位多次準備歡迎他的大會，都因他踐約而沒能舉行。為此他在八日《申報》一版發啟示道歉。但顯然他是心有餘悸。

四月六、七、八日三天，蔣介石完成了全部的實施計畫。這些計畫包括：嚴令一切武裝糾察隊必須在總司令部管轄之下，凡未編入國民革命軍而攜帶武器的人員必須解除武器；查封武漢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駐上海辦事處；控制媒體，凡武漢消息，只要妨礙革命的，一律不許刊登和轉載；檢查武漢與上海的往來電報和信件；發表《國民黨連日會議黨務之要點》；宣布在上海成立上海政治委員會……

在這些計畫中，發表《國民黨連日會議黨務之要點》是重中之重，必須搶在汪精衛之前公

布這些要點。在宣傳上，蔣介石原本不是汪精衛和共產黨的對手，但他對汪精衛不辭而別、悄悄離開上海感到憤怒。汪一走，促使他終於對自己先前的判斷畫了句號。他在日記中寫道：「連日歡談，始知其為偽。」「發表與汪兆銘重要談話之要點，使彼不得藉以造謠。」

陳果夫在「汪三條」的基礎上，悄悄補了一條：「凡工會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部指揮。否則認其為政府之陰謀團體，不准存在。」正因為有這一條，總司令部發出布告才有了合法性。

《國民黨連日會議黨務之要點》的主旨是要各方勢力一律停止活動，一切都等將於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中央全體執行、監察委員聯席會議後，再作決定。《要點》公開發表後，在客觀上造成誰都不允許行動，只有蔣介石可以動的結果。蔣介石的「動」是馬上宣布成立上海政治委員會。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由陳果夫、吳稚暉、白崇禧、虞洽卿、鈕永建等參與其中。

這個委員會非橫空出世，而是兩個多月前便在南昌的中央政治委員會上通過，當時上海並無「上海市民大會」這個組織。當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占領上海後，成立了自己的政府。這是蔣介石的最大心病，他絕不能允許上海落入共產黨人之手。

汪精衛的離開，創造了宣告成立上海政治委員會的時機。蔣介石賦予這個委員會「決定上海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並指導當地黨務。它的成立，無聲地宣告上海市民大會壽終正寢。

同時，他請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等離開總部行營，以中監委的身分開始行使職權。這

是掩人耳目的重要一環，不僅顯得蔣介石支持上海政治委員會是公正的，同時使得他對一個重要「呈文」的復函不僅公正，而且合法。

這個「呈文」是為合法建都南京而必備的一份文件，炮製這份文件的便是吳稚暉、陳果夫兄弟弄的〈檢舉中國共產黨謀叛〉的呈文。呈文以中央監察委員會之名上呈，還附上了一份長名的名單，請國民黨中央、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及地方軍事當局作「非常緊急之處置」。

蔣介石在復函中指出：「事關叛亂黨團，中正所轄各軍防地已十萬火急電令照辦，靜候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共議處分矣。」

而這份所謂的「呈文」就是在蔣介石行營起草的。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如果不離開行營，那就等於告訴公眾：他們在這個房間寫好「呈文」，然後拿到另一個房間找蔣介石批准。

關於如何對付武裝工人糾察隊，也已有結果：以杜月笙、陳群等人的中華共進會作為進攻工人糾察隊的主力。這個組織已招募集中了數百人住進法租界，並得到各租界巡捕房的默許。在上海的外國機構認為，直魯聯軍撤離後，上海的中國政府實際上已不存在。要保護上海租界不受共黨分子騷擾，必須依靠華人勢力，杜月笙等成為他們眼中合適的人選。蔣介石給中華共進會撥付了六十萬元巨款作為活動經費，現在可以說，只要下達命令，這股勢力便會撲向上海總工會。

更重要的是，周鳳歧的二十六軍接管了上海防務。這支不久前投誠的軍隊原是孫傳芳的手下，萬一中華共進會出現問題，周鳳歧這支預備隊可以隨時頂上；將來如果在屠殺共黨的問題上遭到非議，也與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無關。而此時，南京的二、六軍完成渡江，只有第二軍的三個

團在南京衛戍，不足掛齒。

雖然萬事俱備，但蔣介石還在猶豫。毫無疑問，決定「清共」是他有生以來最難做的決定之一，他不得不反反覆覆地考慮得失以及後果。家國天下的方方面面可能都會因為這個決定而發生劇烈變化。

當七日傳來北京張作霖搜查了俄國大使館及遠東銀行等處的消息時，他還給俄國駐中國代埋大使齊爾內赫發了慰問電，表示對北京政府的憤慨。蔣介石在各方面依舊是以蘇俄的朋友面目出現。

終於，有件大事觸發他按下了行動「按鈕」，這件大事便是武漢方面決定遷都南京。蔣介石聽到這個消息後，嚇出一身冷汗。

程潛、林祖涵、李富春在武漢已把上海、南京的所有情況報告給了鮑羅廷。

鮑大鬍子敏銳地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提議召開緊急政治委員會，議題就一個：為應付目前嚴的重時局，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往南京。

這個議題在八日召開的武漢中央擴大會議上通過後，迅速傳到上海。

「可惡啊，這是在逼我做出分野決定。」蔣介石得知武漢公開宣布遷都南京後怒火沸騰，他知道，絕不能讓幾個月前的遷都事件重演。如果失去了武漢，再失去南京，恐怕下一個機會就要等打下北京了。可要想取得北伐勝利，談何容易？

孫傳芳依舊在反抗，張作霖的奉軍是那麼好打的嗎？馮玉祥是什麼人？聯馮打張？搞不好就會變成馮張打蔣了。

蔣介石咬牙切齒地橫下一條心，拍板做出了四個決定：

- 一、上海全城戒嚴，白崇禧、周鳳歧為戒嚴正、副司令，同時頒布《臨時戒嚴條例》十二條；
- 二、命令進入南京的嫡系部隊切斷進出南京的鐵路，對城內第二軍的三個團執行繳械；
- 三、切斷鄧演達與薛岳的後路。武漢方面的鄧演達以及他率領的北伐軍總政治部是個麻煩，這是一支能與蔣介石抗衡的政治隊伍，而鄧演達在很多方面比共產黨還左，先解散他的北伐軍總政治部，讓他名不正。至於薛岳，讓他辭職，不辭就撤職，何應欽已推薦他的老鄉、時任第十四師副師長的鄧振銓接替薛岳；
- 四、自己與何應欽馬上先入為主前往南京。那裡的問題需要總司令坐鎮指揮方可徹底解決，同時為了避嫌，有必要遠離即將硝煙四起的上海。蔣介石告誡自己，哪怕情況再緊急，也需要備好後路。

上述四個決定九日公布，並要求陳果夫等人在蔣介石離開上海後，立刻發表早已寫好的救黨護國通電，以造成必要的輿論氛圍，為下一步行動做好突破口。

民國十六年四月九日，「清黨」以及與武漢分野的一切準備全部就緒。在接到南京安全的報告後，蔣介石與何應欽到達南京，而去南京的公開理由竟然是遵守武漢中央的訓令。

到達南京後第一件事便是給汪精衛等發電報：「電漢口汪兆銘、譚延闓，南京程潛、何應欽，上海胡漢民、宋子文，南昌朱培德、李烈鈞，廣州李濟深、甘乃光；中正已於本日進駐南京（駐舊督署）。東南雖已底定，北伐尚未成功，各項進行事宜，亟待解決，務請諸同志於本月十四日以前，駕臨南京，籌商一切，不勝盼禱，並請示覆。」

蔣介石一方面擺出姿態，不讓局外人明白他心底的打算。另一方面在南京擺下鴻門宴，看看有誰敢來。他知道汪精衛是不會來的，但他不來又有什麼關係呢？黨內另一巨頭胡漢民會來呀。

而於當天從上海發表的「救黨護國通電」，口吻就比蔣介石的電報嚴厲許多。這篇洋洋三千言的通電由國民黨重量級人物聯名，他們均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黃招竑、鄧澤如、李石曾、古應芬、陳果夫。

通電毫不客氣地指責武漢中央聯席會議的種種謬舉，列舉了十一件「可痛心者」的事後指出：「長此以往，不獨北伐困難，而本黨百萬黨員與朝夕以求中國的自由平等之民眾，亦將何所寄託？險象如此，詎能再安緘默？是痛切陳詞，望我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被髮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披瀝奉陳，敬候明教。」

這篇通電，在蔣介石看來就是篇「清共」宣言，如同史上的〈湯誓〉、〈牧誓〉一般。

蔣介石到達南京之前，楊虎、溫建剛準備的勞工聯合會以每天四元的雇用費，在南京組織了一批人。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這時也從上海搬到南京，黨部首腦張曙時據說是共產黨。九日這天，南京率先行動，勞工聯合會雇用的人搗毀了國民黨江蘇黨部和南京市黨部，抓到了一大批人，其

中包括農民部長戴益天、商人部長黃競西、宣傳部秘書高爾柏等，市黨部主要負責人侯紹裘在上海被抓，張曙時也被抓住，但後來逃跑了。

不明就裡的總工會還派人到北伐軍司令部請願要求保護，他們哪裡知道正熱情接待他們的人便是行動的幕後指揮者。一明一暗的聯動，南京很快便掌握在蔣介石手中。

經過幾個月的深思熟慮，和經歷了秘密、仔細且萬無一失的準備後，四月十一日，蔣介石終於發出了決定成敗的密令：「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擬定這道命令的理由是：「中國國民黨以共黨滲透黨內，破壞北伐，禍國殘民，故實行『清黨』」。命令發出後，他要求陳氏兄弟，以及楊虎、溫建剛等隨時向他報告「清黨」進展。

在上海，因為「清黨」準備周密，一切都按計畫開始進行。

共產黨此刻在上海掌握的力量主要是兩部分：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浮在面上的領導人有三個：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工人糾察隊總指揮周恩來、副總指揮顧順章。在「清黨」計畫中，此三人是需要最先被解決的，目的是打亂這兩部分力量的神經中樞。

接到命令的杜月笙，精瘦的臉上露出了笑容。老蔣到底按計畫行事了，而他又私下在兩天前就開始布置。

九日，杜月笙派手下萬墨林給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送去了請柬，約他十一日晚到大世界附近的華格桌路杜公館商量大事，杜月笙認為在這裡擒住汪壽華是最不容易引起麻煩的。只要

捉到汪壽華，在湖州會館的上海總工會便可拿下。汪壽華的真名叫何今亮，雖然是共產黨員，卻也是青幫，而且還是「通」字輩，比杜月笙「悟」字輩高出一輩。上海工人第二次暴動時，就是他聯絡杜月笙保護在法租界的暴動指揮機關。

晚上八點，汪壽華獨自一人出現在三層樓的杜公館時被抓，旋即被殺，沒有一點懸念。

關於汪壽華的死，一直有三種說法：一是杜月笙的手下將汪壽華塞進麻袋，拉到楓林橋活埋了；二是杜月笙把汪壽華交給了白崇禧，在龍華北伐軍東路軍司令部被處死；三是扣留汪壽華後，將他送到公安局，但公安局不敢拘押他，便在黑夜裡把路燈熄滅，放汪走，卻又埋伏好槍手，在蓬萊市場附近，汪壽華被亂槍擊斃，就死在共產黨的老朋友謝澹如親戚的後門口。

不管何種死法，二十六歲的汪壽華都是在蔣介石「清共」中犧牲的第一位共產黨高級領導人。

幾乎在同一時間，設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裡的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接到北伐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長斯烈的急函，請周恩來、顧順章去師部商談重要問題。

周恩來認為與斯烈見面或許可以爭取此人，而且斯烈的弟弟斯勵在黃埔軍校時，周恩來是政治部主任。結果，在寶山路二師師部，周恩來被斯烈扣留，同去的顧順章一看情況不妙，逃了。

萬幸的是，處於地下的中共中央很快得知了消息，立刻由時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的羅亦農派人找到二十六軍黨代表趙舒。此人並不清楚抓周恩來是蔣介石「清共」的重要環節，他立刻與

工人糾察隊的地下黨員黃逸峰一起趕到二師師部。斯烈是趙舒的老部下，只得執行趙舒的命令，釋放了二十九歲的周恩來。而趙舒隨後以「目前各方怪象叢生，惶惑萬狀」為由辭職了。

但這時，對上海總工會、上海工人糾察隊的繳械已基本完成。過程很簡單：

十二日，中華共進會五百多人臂戴白布黑「工」字袖章，乘車通過法租界。

周鳳歧的部隊進行偽裝後，也獲准從公共租界通過，這是早就與租界巡捕房溝通好了的。巡捕房在他們通過後，立刻用路障封鎖了租界，以防有人逃入租界尋求庇護。

這兩批人到達兩個最重要的目標——閘北湖州會館和商務印書館俱樂部時，兩處都已群龍無首。雙方發生衝突，槍響後，周鳳歧的部隊出現。說為了調解勞工組織之間的矛盾，要求雙方都繳械，以恢復秩序。結果除上述兩目標外，華商電車公司、三山會館、浦東、吳淞、江灣等地的兩千七百多名武裝工人糾察隊同時被繳械。

十二日整整一天，在混亂的上海，了解真相的人沒有幾個。中共中央以及總工會等一班人還蒙在鼓裡，以為是誤會，要求北伐軍將槍械交還工會，還指出蔣總司令是支持工會的，他給工人糾察隊送過錦旗。

到十三日，共產黨終於明白過來，敵人是在有組織地進攻啊。便不顧白崇禧的戒嚴令，號召工人舉行總罷工，宣稱「誓死奮鬥，寧死於以國民革命為旗幟的軍隊之手，雖死猶榮」。

中午時分，在閘北青雲路總工會舉行了一場群眾大會，並開始進行請願，要求發還被奪槍

枝，懲辦工會的破壞者。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二十六軍第二師師部時，頭天放走周恩來的斯烈下令開槍。

在這支手無寸鐵的請願隊伍中，有不少是婦女、孩子。槍聲響起的一瞬間，天空突然下起滂沱大雨。槍聲、雨聲、大人的叫喊聲、小孩的哭聲霎時在街面瀰漫，遊行的隊伍散了，人們四處狂逃。然而，機槍聲並沒有停下來。寶山路成了一條血河，一百多人倒在血河之中。

一場大的搜捕在全上海同時進行。國民黨各軍部、各帥部、各政治部，還有綏靖處、特務處、諜報處、稽查處、警察廳等，全部都在抓人。除了抓人，辦事人員更是整夜打牌，大嫖大賭。

四月十三日《申報》在第十三版的本埠新聞中用了整版報導這起事件，總標題是：「淞滬工人糾察隊昨均被繳械」。記者從不同地方發回的報導中透露了以下信息：一、起因是臂戴白布黑「工」字袖章的便衣軍挑釁，與工人糾察隊發生槍戰衝突；二、參與繳械的是二十六軍二師等北伐軍；三、繳械中，部分軍隊開了槍；四、全部死亡人數為「百餘之眾」；五、有英國飛艇到了商務印書館俱樂部上空偵查；六、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是顧順章（沒有提到周恩來）。

但在對青雲路群眾大會的報導中，《申報》有這樣的文字：五萬餘人的市民大會散會後，即出發遊行。由青雲路、寶興路、中華新路至湖州會館，沿途高呼口號……至湖州會館後，群眾一湧而入……宣告即日起總罷工。駐在軍隊當即撤退，秩序仍由糾察隊負責維持，該會亦於群眾拍掌高呼聲中，繼續辦公。

正在上海與王映霞熱戀的作家郁達夫，在四月十二日的日記中記錄了他看到、聽到的情況：

「晴，東天未明，就聽見窗外槍聲四起。起床來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出戶外，向駐在近旁的兵隊問訊，知道總工會糾察隊總部，在和軍部內來繳械的軍人開火。路上行人，受傷者數人，死者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險奪圍，想衝出去，上南站去乘車，不意路途為戒兵所阻。

午後出去訪友人，波及此番蔣介石的高壓政策，大家都只敢怒不敢言。從友人處出來，又上南站去打聽滬杭車。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大學上了一小時課，冒雨回到英界，向鼎新旅館內投宿。

上床後，回想映霞心切，不能入睡。同鄉陸某邀我打牌，就入局打了十二圈牌，至午前三時就寢。」

從郁達夫的日記看，上海的正常生活秩序並沒有因對工人實行繳械而發生混亂。

「四一二」事件時，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從美國來上海的路上。到達上海後，她強烈地感到了這座城市瀰漫著恐怖血腥味。她想找到一些工人領袖，以了解到更多的情況，但她一無所獲。有位美國同仁告訴她：蔣介石都沒有找到他們，你大概也不可能找到，你去找反而會給他們帶來危險。為了完成採訪，斯特朗只得去了武漢找她早年相識的老朋友鮑羅廷。

蔣介石很滿意出現這樣的局面：聽命於武漢中央的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被封閉，陳群接管了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楊虎等人搞的上海工人聯合會接管了總工會。

「清黨」而不發生混亂恰恰是蔣介石所需要的。上海是他的金庫，不能淪於戰火騷亂的恐怖之中。廣州也一樣，那裡是他發跡之地。但這種思想他始終沒明確向周圍的人透露，就連楊虎、溫建剛等都是糊塗的。當「清黨」行動開始後，他們居然不知該如何往下走？向蔣介石發電詢問：「現在是否仍容納共產黨，對搗亂分子如何處置？」在上海坊間，開始流傳一句象徵恐怖的話：「養虎成群。」蔣介石自己則成功地避開了漩渦中心，成了站在一邊評判的第三者。

接下來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南京政府，而建立政府沒有經費是不行的。以虞洽卿為首的上海工商界一直要求蔣介石恢復秩序，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現在我蔣中正做到了，該是工商界兌現諾言的時候了。

蔣介石希望能得到七百萬元的贊助，同時拿到三千萬元貸款，這樣便可以解決成立政府的財政問題。為了與工商界長期合作，他準備南京政府一成立就通緝那個討好孫傳芳的上海總商會會長傅筱庵，並把會長的位置還給虞洽卿。這也是兩個月前對虞的承諾。

在「四一二清黨」行動中，唯一讓蔣介石遺憾的是沒抓到共產黨的大官。而行動前，他設想過如何與成為俘虜的周恩來對話。到那時，周恩來不會再有三十日見面時的風度吧？可現在，這位當年從國外請回來的人才無影無蹤了。蔣介石想，如果是我的嫡系部隊執行這次行動，恐怕周恩來、顧順章便逃不掉了，這也是命令不十分清楚造成的後果。

蔣介石並不知道〈汪陳聯合宣言〉就是周恩來促成的。周拿著宣言先讓汪精衛簽字，再讓作者陳獨秀簽字，然後送報館。蔣介石更不知道，周恩來從斯烈處脫險後，得知已無力挽回局

面，便獨自雇了一條小船，潛入浦東貧民區。但這裡也是周鳳歧的布控點，所以周恩來再次被來棚戶區搜查的二十六軍第一師某團士兵抓捕，審問他的是該團團長鮑靖中。這位黃埔四期的軍人一看，面前的人竟是自己老師，馬上決定幫助周恩來，立刻找來一套士兵軍服讓周恩來換上扮作衛兵，用戰馬護送他出了浦東，到達真如火車站。

（這一段歷險很可能記錄有誤。在黃埔一至四期的學員名單中，並無「鮑靖中」其人。《申報》的報導僅說顧順章被拘禁在寶山路天主教堂，那裡是二十六軍二師師部，時間為十二日七時至下午三時。而有文獻稱，四月十三號，郭沫若還在李一氓住處見過周恩來，他勸說周恩來速速離開上海。）

周恩來並沒有趁此機會離開上海，而是又轉移到吳淞附近徐家宅，他要與廣州逃出來的妻子鄧穎超會合（鄧三月二十一日在廣州分娩，一個近十斤重的男孩兒因難產而夭折了）。直到五月下旬，才由他一手培養、後成為共和國大將的陳賡陪同，乘英籍輪船怡和號前往武漢。

這時，上海對「伍豪」（周恩來）的懸賞金已加到了八萬大洋。十三日，蔣介石發布了〈告中國國民黨同志書〉，中心內容是揭發共產黨踞湘鄂陰謀。他在這篇近五千字的文告中，為自己北伐以來的所作所為做了徹底辯護，從主張遷都武漢到改主張遷都南昌，從陳銘樞被迫離開武漢到武漢聯席會議被共產黨篡權，都一一進行解釋。他指出：「今日我軍以血戰克復之名城，明日即成彼黨以陰謀襲取之營壘。」他還委屈地說：「人心未死，公理何存，長此顛倒，何以為軍。以黨治國，為本黨唯一主張。共產黨認定樞紐所在，處處把持黨務，無處不握黨中之重心地位。」

至於欲加入國民黨者，非先表示能與共產黨同聲相應不可，至多年之純粹黨員，欲求一度登記而不可得。」

蔣介石在文告中把九江、安慶、上海的「清黨」說成是：「不過民眾與民眾，黨部與黨部之衝突。」這與他事先考慮好的計畫一脈相承，即這些事與北伐軍無關。說到二十六軍開槍之事，他辯解到：「如上海之糾察隊，多係招集孫傳芳、華庶澄之散兵，予以利器。四月十三日圍攻湖北第二十六軍司令部之時，當場捕獲九十餘人，其中四十餘人皆身帶直魯匪軍遣派之證號。」

在把共產黨說得一無是處後，蔣介石搬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他堅決地認為中監委對共產黨的彈劾是英明的，指出：「中正統率全軍，誓死服從中央命令與決議，願作我同志同胞之先驅。」他同時宣告：「中央黨部已經成立，與國民政府同時建都南京。」

這篇文章，蔣介石有意把自己變成旁觀者，當做忿忿不平者。表面看是好像解釋辯駁詞，實則是定都南京、鞏固蔣氏政權的宣言。他再也不是「遷都」，而是直接「建都」了。但關於這次武力「清黨」，還未見在蔣介石的日記中有記錄，他自己說道，有些事情是不能記的。過了大約十九年，他發表《蘇俄在中國》，再次全面闡述了國民黨與蘇俄合作所受到的傷害。

據後來的有關統計，十二日前後，被收繳的武器是：三千枝步槍，二十挺機關槍，兩百枝毛瑟槍，四百枝手槍，八十萬發子彈，幾推車斧頭和兩千枝長矛；被打死的工人有三百多人，失蹤的達五千人。就此，俄國人出了三萬大洋援助的上海三次工人起義徹底失敗了。

可笑的是在同一天，武漢的羅易竟以第三國際代表團的名義給蔣介石發來通電，稱：「閣下已決意在南京召集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若干委員開會。這種舉動顯然違背閣下與汪精衛訂立之協議……革命的敵人將自然把此事解釋為國民黨內部破裂……基於局勢危殆，我們敦勸閣下放棄原定的南京合議……在這危急關頭，破壞國民革命戰線的嚴重責任將由閣下負之。我們勸請閣下贊成將黨內問題之一切爭執，交由中央委員會之全體會議處理。閣下若採納此說，我們將欣然造訪南京，與閣下親自討論一切重大問題。第三國際將盡全力幫助一切革命力量形成統一的國民革命戰線。」

而事實是，在蔣介石軍中的俄國軍事顧問並沒有因為「清黨事件」、「寧漢對峙」而撤走，甚至沒有提出抗議，還像北伐初期一樣恪盡職守。從後來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宮一直在猶豫，他們不知道中國局勢會朝什麼方向走，他們也不知道到底是應該支持左派還是右派？還是全力扶持中國共產黨？

看到這份通電，蔣介石哭笑不得。中國人從來都講究察言觀色，而這些老毛子怎麼會如此之愚蠢？他把通電扔在一邊。此刻，需要他決定的事情太多了，開弓沒有回頭箭。現在首要的大事是，在南京迎接願意與他合作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監察委員會委員們。他知道，事先均已做好充分準備，接下來的建都問題會簡單很多。

四月十四日，胡漢民、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鄧澤如以及陳果夫等人如期到

達南京。

按預定計畫，胡漢民高調介入成立南京中央政府的工作，他此刻的官職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委。只是這個常委在沒與蔣介石合作前無任何權力，混在上海靠翻譯寫字維持生計。

胡漢民在孫中山死後，曾出任過代大元帥，被人稱為「最了不起的一位幕僚長，歷史上少有的—位相爺」。蔣介石的軍事才能在「東征」後得以讓人刮目，而正是胡漢民下達了「東征的命令」。如今，他重返政壇，目的是幫蔣介石解決成立南京政府所面臨的各項政治法理問題。

計畫分兩步走。十五日先召開國民黨中執委、中監委委員談話會。既然是談話會，就不必考慮法定人數，從而解決了法定人數不夠的難題。但這個談話會做出的決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決定十七日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

原與汪精衛商定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可汪兆銘等武漢一千人的缺席，造成開會人數不夠，全會無法召開。在胡漢民等的指點下，蔣介石並沒有強行召開全會。而不開全會也能達到建都南京的目的。

可不管召開什麼會議，都需要有一定的法定人數才能宣告世人，但此刻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執委只有五人。胡漢民決定重新啟用「中央政治會議」為會議名稱，參加會談的人都可稱中央政治委員。於是蔡元培、李石曾、鄧澤如、何應欽、白崇禧、陳銘樞等都被增進為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人數不成問題了，這是計畫的第二步。

關於「中政會」，這是蔣介石在上一年剛玩過的政治遊戲。中山艦事件後，他操縱中央執

委會通過決議，將中政會與中常會合開，稱之為中央政治會議。但在武漢召開的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取消合開的中央政治會議。蔣介石清楚，要想順利地實現軍政、訓政，需要一個表面在中執委之下、實際凌駕於中執委之上的機構，這個機構既可以靈活處理黨內所有問題，又歸自己獨裁。

胡漢民重新抬出中政會，可謂在夾縫中找到了一條大道。事實是後來中政會成為了一個比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更大的機構。

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十七日在南京如期召開，這次會談的決議被標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七十次會議決議」。

一切都按蔣介石的思路進行，且看起來是那麼正規、那麼合法。會議議決了幾項決定：

- 一、從四月十八日起，國民政府在南京辦公，同時舉行慶祝典禮。
- 二、推舉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鈕永建為國民政府秘書長。
- 三、吳稚暉任總政治部主任，陳銘樞為副主任。
- 四、由張靜江牽頭，組成浙江政治分會。
- 五、由馬敘倫牽頭，組成浙江省政府。
- 六、成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
- 七、成立國民黨中央組執委員會。
- 八、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改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海分會。

同時還議決了南京政府的官員任命，胡漢民、蔣介石、張靜江、吳稚暉、蔡元培、李宗仁、何應欽等為政府委員。伍朝樞為外交部長，王寵惠為司法部長，薛篤弼為民政部長，王伯群為交通部長，古應芬為財政部長（錢新之代），蔡元培為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委兼大學院院長。

而就在前一天，蔣介石還召開了一個聯席會議，號稱是中央政治委員會與軍事委員會聯席會議，推舉譚延闓為聯席會議主席，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這是他實行軍政的重要一環。

到此，蔣介石長鬆了一口氣。從現在情況看，「清黨」已非一次孤立行動。國民革命的大本營廣州在李濟深的指揮下，已於十五日凌晨開始「清黨」。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在黃埔軍校「清黨」，在校的第五期學生三千多人完成了淨化。

與此同時，無錫、寧波、福州、廈門等也開始「清黨」。安徽在李宗仁控制之下。江西的朱培德開始鬆動，有向南京示好的跡象。接下來要對唐生智控制的湖南進行瓦解，還需要對武漢進行軍事打擊，以滅掉汪精衛的威風，迫使他向南京靠攏。

讓蔣介石高興的是，「清黨」得到來自各方的支持。上海商業聯合會和銀兩業公會分別發表擁護「清黨」電報，表示願做「清黨」後盾；雲集上海的各國列強也讚賞他處置得當。日本《朝日新聞》說「清黨」是：「驅逐在武漢派後面之鮑羅廷以下之俄國勢力，此點與北方軍閥之主張實屬一致。」

對汪精衛、鄧演達等人的謾罵，對武漢政府的一系列開除他職務的決定，蔣介石都沒放在心上。只是有件他真正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遠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的兒子蔣經國公開罵他。蘇俄《真理報》全文登載了經國在中山大學聲討蔣介石大會上的發言，發言中說：「過去他是我的父親、革命好朋友；去了敵人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還當場聲明斷絕父子關係。

把「三綱五常」看成是日常行為準則的蔣介石，明知兒子的講話並非出於真心，可還是感到十分難過。他把經國在上海讀書時的監護人陳果夫找來，訴說心中的煩悶。

蔣介石對陳果夫說：「奈，經國十一歲離開漢口到上海浦東讀書，你每月給他銅鈔，後來交易所破產，每月給經國十五元衣裳費都付不出。現在依舊思之傷心。」

對於當年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破產，在蔣介石心裡，陳果夫是有責任的。他曾在日記中寫：「果夫之為人，利己忘義，太不行也，當痛斥之。」可陳家兄弟是英士兄之侄，對自己倒也忠心。此次「清黨」，他兄弟可謂文武雙全，把建立政府所需之文件都準備妥帖。

陳果夫當然不敢在這位叔叔面前妄議他的兒子，只解釋說：「經國是懂事的小囡，他的言論一定是身不由己。」

蔣介石彷彿在回憶：「貧富生死，率有定數。得此不足為富，無此不足為貧，況預備死者未必死，但求生者未必生。只是對經國教育無方，終難辭責。」

見蔣介石自責，陳果夫猜不出他究竟要說什麼，不敢接話。蔣介石繼續說：「在廣州時，我給經國寫信，要他多讀書，去商務印書館買英文小說雜誌看，要他懂得英文的重要，教他對待

讀書必須反覆研習，也要使一字不忘為止。現在他卻在俄國學俄文，並用學到的俄文來罵我這個父親。」

善於處理人際工作的陳果夫進退兩難，該如何勸慰這位剛下決心「清共」的總司令呢？

見陳果夫不吭聲，蔣介石嘆口氣問：「經國與我劃清界線所言，在我看來，不過是為自保，我能指責他不孝嗎？」

陳果夫立刻說：「經國兄弟在俄國一定是被環境所迫，我以為他現在能保住性命，就是最大的孝啊。」

這話正中下懷。蔣介石看看他，微微頷首道：「看來經國一時回不來了，你要想辦法打聽他的消息，愈詳細愈好。我現在不知該如何向他母親交代。」

陳果夫說：「請校長放心，經國也是我的兄弟，我會盡最大努力盯住這件事，只要有任何一點可能，都會想辦法讓他回國。」他停了一下補充道：「從俄國沒有撤走我們軍隊裡的軍事顧問這件事看，他們不會太為難經國兄弟。」

蔣介石搖搖頭說：「史達林是看我還有利用價值。聽天由命吧。」他話鋒一轉，說：「此次『清黨』，你務必要搞清楚一些根本的問題，比如共產黨再多，也沒國民黨多，而用武力『清黨』必然會出現良莠都殺的情況。你應當考慮在什麼時候開始制止濫殺濫捕，殺戮既開，收刀就難了。」

陳果夫點頭說：「校長，要想使我們黨變得純潔，這樣的行動遲早要做的。西山會議派發

了電文，說我的行動是掩耳盜鈴。」

蔣介石擺擺手：「不管是西山會議派，還是汪精衛、鮑羅廷，對我們的一切指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完成總理的建國大業。我十四日讓你要各報暫緩發表彈劾共產黨的文件，現在可以發表了。另外，把準備好的『清黨』通電一併發表。」

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蔣介石為之殫精竭慮的南京國民政府，在南京丁家橋前江蘇會議廳宣告成立。整個典禮分為：授受印、照相、閱兵、宴會等。

蔡元培代表中央黨部莊重授印，印文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胡漢民神情嚴肅地代表國民政府受印。蔣介石在一邊掩飾著內心的喜悅，和顏悅色地看著兩個配角在唱重頭戲，心想，總算是把總理的部分遺願實現了。

儀式後，照例是全體合影。蔣介石依舊低調，沒有炫耀自己，而是一身戎裝一股嚴肅地坐在胡漢民右邊第五個位置上。恐怕在照片中的幾十個人中，只有他才真正清楚這個南京政府還需要做哪些事，才可能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央政府。

為了滿足列強承認南京政府的條件，蔣介石違背了國民黨一大決定的不承認北京政府所借巨額外債，宣布承擔償還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所有外債。這也是為了重塑債券信用。

在稍後舉行的慶祝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與恢復國民黨權大會上，蔣介石、胡漢民分別講話。在大露天廣場上，搭了一個高不過一尺的木板台，台上置一張八仙桌，桌邊是一把用於踏腳的高

靠背椅子。兩人踩著椅子登上八仙桌演講，沒有話筒，只用大嗓門兒。胡漢民用他帶著廣東口音的國語發表演講，隨後發表了〈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

宣言通篇都圍繞三民主義來闡述建國綱領，指出：「蓋惟三民主義為救中國之唯一途徑，亦惟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唯一工具。本政府所行政策惟求三民主義之貫徹，凡反對三民主義者即反革命，反對國民革命而有階級獨裁者即為反革命……」

宣言提出了四條國民革命方略：「一曰使黨軍愈與人民密切的相結合；二曰造成廉潔之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之實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之利益並扶助其發展。」在講話中，胡漢民沒有忘記吹捧拉他出山的蔣介石，表示要一致擁護蔣總司令。

這個宣言的真正目的是以三民主義為盾牌，宣告「清黨」運動的合法化。

在當天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的歡迎宴會上，蔣介石端坐第一桌正中，在他的旁邊是胡漢民，再往邊上是馬·伊·卡扎寧（蘇聯顧問的中文翻譯）和李翻譯。蔣介石把晚宴當成了他自己的「慶功宴」，發表了七千字的長篇講話〈建都南京告全國同胞書〉。講話中，他顯然已經把自己與中國政府等同起來，對中國共產黨和鮑羅廷大肆攻擊。據勃拉戈達托夫（蔣介石軍事顧問加倫將軍的副手）在他的回憶錄《中國革命札記（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說，當晚蔣介石「愈講愈起勁，愈來愈慷慨激昂。聲調不斷提高，甚至發出尖叫」。

接著蔣介石又發出〈通告各軍擁護奠都南京電〉。他堅信，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在擁護奠都南京電中，蔣介石用飽含深情的語氣，講述他如何盼望這一天到來：「中正上奉中央之指揮，下賴將士之忠勇，轉戰七省，幸告肅清。乃因黨內糾紛拉大，危及國民革命前途，憂慮徬徨，莫知所適……今幸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叛徒陰謀，清源正本，中央政治會議繼續總理遺志，奠都南京……中正欣喜之極，不禁涕零。嗣後當秉吾血誠，恭聽命令，率此部屬，擁護中央，掃除一切反革命之叛徒，再行實現三民主義之初志……」

這個通電，蔣介石表明了他的觀點和立場。在《告全國同胞書》中，更是從十個方面闡述了他的政治主張。從打倒帝國主義入手，再講北伐之意義，然後將矛頭直指共產黨：

「寄生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蒙國民黨的招牌，藉國民革命之掩護，處處擴張他們的勢力，運用他們的陰謀，實行他們破壞的恐怖政治。」

他說共產黨的政治，使「經濟破產，教育破產。破壞外交政策，破壞篡竊國民黨，破壞軍事」。事」。

「現在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軍，破壞國民黨，破壞中國的陰謀毒計，事實一一暴露。」

然後，他開始捧自己建立的南京政府：「主持黨務中樞的，又多為老成碩德，數十年前從事革命，為思想界前驅，而全國久已屬望的先覺。」

接著他為自己辯護：「至於他們誣中正為『新軍閥』，更是惡毒可笑。世界上哪有為主義而戰的軍閥，真是千古奇談。軍閥把持的是地盤。我國民革命軍打到什麼地方，就讓什麼地方的人民去統治。軍閥要的是財產。中正轉戰經年，一身以外無長物。軍閥愛惜自己的生命，斷送的

是將士的生命。中正則自北伐以來，每每身先士卒，早把生死置諸度外……」

他在最後指出了中華民族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條是還到軍閥統治下，那樣中國將連年戰爭；一條是跟共產黨走，受國外特殊團體的指揮，中國還是沒有出路；一條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堂堂大道，那就是謀自己的利益，求自己的解放。

這兩篇文稿把蔣介石從一個單純的軍事指揮員，變成了一個政治人物，並威嚴地站到世人面前。這是他將要以鐵腕手段實現軍政的鋪墊，也是他要在其他軍事集團面前率先告之的名正言順的東西。他自己清楚，雖然是總司令，可在這個兵荒馬亂、動亂不堪、贖武主義橫行的年月，誰有槍誰為王。僅僅一年的北伐，北伐軍已從開始的八個軍變成如今不知幾個軍了。眼前的桂系，就是他看著迅速膨脹起來的，迫使他不得不反覆與桂系合作，以抑制唐生智的湘軍和楊森的川軍。

同一天，陳果夫整理的〈中監委彈劾共產黨謀叛咨文〉正式發表，附在咨文後有一份名單。這便是南京國民政府發布的第一號命令：通緝一百九十七名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頭目及次要危險分子：

「鮑羅廷、陳獨秀、鄧演達、徐謙、林祖涵、譚平山、惲代英、羅亦農、毛澤東、李立三、瞿秋白、周恩來、蔡和森、張國燾、郭沫若、劉少奇、方志敏、張太雷、顧順章……」

有意思的是，已被處死的汪壽華、侯紹裘也在名單之中，是蔣介石不知道？還是裝不知道的？

位於南京東郊十幾公里的小湯山，以溫泉而著名，是休養勝地。

南京政府成立後，胡漢民等就常將重要會議安排在這裡召開。春風得意的蔣介石很喜歡這裡的溫泉，他覺得溫泉能洗盡身體的髒污，而此地有一千五百年歷史的隆昌寺則能淨化心靈塵埃。只是有一些無奈和遺憾，其他要員都是夫妻雙雙，而他形單影隻。

多年未離開過女人的蔣介石在強迫自己鍛鍊意志，他明白接下來的考驗是什麼。與宋靄齡在九江的會晤具有歷史意義，蔣宋結緣最重要的一環是宋美齡。蔣介石在小湯山冥思苦想，必須在短時期內與這位三小姐見面，是在上海見還是在南京見？他感覺到，只要這件事辦好了，其他的事都是小事。

南京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即四月十九日，武漢國民政府就誓師二次北伐了。蔣介石並不介意有人搶他的北伐功勞，他喜歡看到混亂的局面。但興奮中的他大意了一件事，忽略了給立下汗馬功勞的桂系相應的果實，導致桂系在此次建都中沒有獲得實質地位。《北學捷報》、《晨報》發表評論，認為桂系苦戰一年，只獲得了一個「鋼軍」的稱號和兩萬人的傷亡。這個大意導致了四個月後蔣介石被桂系逆轉，逼宮下野。

內斂的蔣介石清楚，如今中國從政府到黨派再到軍隊，都處在分裂狀態下，北京、武漢、南京三個政府並存。雖然南京是西方列強（除俄國外）希望保持穩定的中央政府，這也是蔣介石

願意承擔所有中國外債的結果。一個政府光有槍桿子是不行的，還需要有經濟支撐，而下好經濟這步棋，關鍵棋子就是宋子文。原本南京政府成立，宋子文就應該出現在內閣名單裡，可這個驕傲、自以為是的金融家尚未就範。已和宋靄齡商量過，先封了宋子文在上海的辦事處，讓他回不去武漢，成為一個無廟可歸的和尚，然後再以官位利益相誘，不信他不來南京。

為了得到銀行業支持新政權，他在本月還做了一件「出格」的事：當得知張嘉璈的母親在上海去世時，他並未因從未與張嘉璈見過面而放棄千載難逢的機會，而是帶著衛隊親臨弔唁，突然出現在張家的靈堂納頭便拜。非常看重禮節和規格的張嘉璈感動了，他說服陳光甫、錢永銘等一千銀行家，決計支持蔣介石和他的新政權。這為蔣介石日後與宋子文聯手改組中國銀行埋下伏筆。

國內三個政府並存是問題，而在國民黨內部形成的武漢、南京、西山會議派三個黨部也是大問題，如何戰勝其他兩個黨派呢？

軍隊則更亂，孫傳芳、張宗昌尚未消失，吳佩孚並不死心，張大帥想南下，馮玉祥又在玩他的老花樣：占地盤。閻錫山當然還是在觀望。

既然武漢已誓師北伐，於公於私，南京方面都不能落後，但前提是必須把建都的事處理穩固了，同時要搞清楚武漢確實不可能東征南京後才能下決心。還要力爭做到我蔣中正在哪裡，黨就在哪裡。

他在思考，如果武漢的軍隊離開了，是不是武漢就空虛了？想到這兒，突然興奮起來，能

不能在軍事上做點文章，使一招借刀殺人計？有很多情報顯示，唐生智的湘軍中有相當數量的軍官士兵對湖南的農民運動已忍無可忍，他們的家屬據說很多受到農民衝擊，能不能在他們中找到突破口？

儘管蔣知道，時下所做的一切並不完全合法，但他依舊盡量做得滴水不漏。

二十一日，蔣介石命令將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從廣州遷到南京辦公，並發表了〈告全體將士書〉。又是一篇二千二百多字的長文，進一步闡述說他「清黨」的理由。

這一次他從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日的「中山艦」事件說起，再講到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認為都是因為有共產黨而造成今天的局面。他為自己被人說成是「獨裁」而辯護，並透露了軍費情況：「我在南昌報告過，從去年七月到十一月，五個月時間，我們以五十萬大軍，死傷了三萬多將士，轉戰了六、七省之多。除經常費用外，戰費只有現金二千三百萬，平均每月所得的，不足兩百五十萬，請問世界上哪次戰爭的戰費像這樣經濟？……」

二十四日，來自陸軍、海軍擁護南京政府的通電陸續到了。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楊樹莊等人都表示：否認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決議及所發出的一切命令。

五月一日，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發布命令，將東線北伐軍編為三路，繼續北伐。

第一路總指揮：何應欽，目標是肅清孫傳芳軍；

第二路總指揮：蔣介石自兼，白崇禧代理，由南京上游渡江，擔任正面作戰；

第三路總指揮：李宗仁，目標是先解合肥之圍，再攻蚌埠。

對於再次出兵，蔣介石心中穩篤篤的。雖然唐生智的部隊沿京漢路往北打，而且戰果不錯，但那是南京的北伐尚未開始。蔣介石相信，只要自己三路大軍一發動，戰績一定會遠遠超過唐生智這株牆頭草的。

在軍事上，蔣介石開始密切注意國民聯軍總司令馮玉祥了。這位善變的將軍靠著蘇俄復出，正在圖謀中原。南京要想取得北伐勝利，就少不了馮玉祥的力量。

與此同時，蔣介石還在琢磨軍事以外的事：如何既與宋家聯姻？又與馮玉祥結緣？還有如何建設國都？要有計畫（後來由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編制的《首都計畫》，成為了中國第一部現代城市規劃）。

至於二期「清黨」的前期目的已達到，剩下的問題就交給陳果夫、陳群他們去辦吧。